

古乐意韵的现代表达

——两场南音交响新作音乐会有感

陈瑜

发表于《人民日报》2018年1月25日

内容提要：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同质化危机，复兴传统文化并从中汲取资源加以转化和创新似乎已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普遍共识。文章通过对中国国家交响委约的两场以福建南音为创作题材的交响作品音乐会，对当下交响音乐民族化创作中如何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了思考和探讨。指出理解传统的艺术规律及其美学观念是对其进行现代性阐释的重要前提。传统音乐的本质规律和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对于构建中国现代音乐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以更多元的视野理解传统、理解中国传统音乐所承载的情感经验以及美学观念，进而追求更深层次的人文精神的交流与对话，或许是中国民族交响乐创作的必由之路。

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同质化危机，复兴传统文化并从中汲取资源加以转化和创新似乎已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普遍共识。这种带有对当代生活经验和感觉的艺术个性表达，映射出当代艺术家文化自觉与身份认同意识的觉醒与求索。近期，由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委约创作并成功首演的“龙声华韵——创新与经典”交响合唱音乐会和“丝绸之路”《长安门》交响合唱音乐会可以视为这一思想转向的集中呈现。两场音乐会集合了当代作曲家以地方传统音乐——福建南音为题材的交响乐新作，分别是作曲家赵石军创作的《出汉关主题狂想曲》、吴少雄创作的交响随想诗《意韵南音》以及印度裔奥地利指挥家、作曲家维杰·乌帕德亚雅创作的交响曲《长安门》。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为此组织邀约作曲家多次赴福建采风，充分体现了国家艺术院团关注重视传统音乐文化并以此探索交响乐中国化的发展路径。同时，这也是南音首次以国家文化形象集体出现在当代音乐创作领域，对南音而言有不可言传的意义。

与我们所熟知的传统南音创作不同，这些新作来自于“他者”对传统经典的阐释与言说。称之为“他者”，是因为此次的作曲家均非南音“局内人”，却都拥有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系统接受西方作曲理论及技法的教育背景。作曲家各自的成长环境、生活经验、思维方式以及对福建南音这一古老乐种的理解与体验差异，构成对待传统艺术截然不同的阐释和表达，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多维视野。

例如赵石军的《出汉关主题狂想曲》讲述的是昭君出塞的故事。他从南音传统曲目《出汉关》旋律中提炼出主部主题，并与蒙古音乐主题对比发展，结合变奏曲和狂想曲曲式结构，描绘了昭君出塞时孤雁离群、思念故土的情感以及和亲的盛大场景。吴少雄的交响随想诗《意韵南音》则完全抛弃了西方和声观念，而纯粹以音程、腔体的概念表达自己所理解的古乐意韵。作品紧紧抓住南音的腔韵特点，以“微旋律”（腔音列）为音乐元素，在追求意念、意象等中国古典美学诉求中探索中国古典音乐风格的交响化路径。《长安门》则是由印度作曲家、指挥家维杰·乌帕德亚雅创作的一部充满哲学意味的大型交响乐作品。作品展现了

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想象。整部作品分为“五常”“渴望”“出汉关”“道德经”四个乐章，作曲家试图从儒家“仁、义、礼、智、信”思想准则、《诗经》“风”“雅”“颂”和福建南音所体现的日常生活情感以及《道德经》中所阐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找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作曲家特别在第三乐章中以南音传统曲牌《出汉关》唱腔、四宝、拍板演奏以及箏、中国鼓等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为作品主要素材，遵循音乐跟随语言声调变化创作的中国词调音乐传统，结合交响乐创作技法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对位风格技巧，为我们了解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提供了一种新的声音体验。

这些以福建南音为素材的交响作品让我们看到了理解传统的多种可能性，其重要意义在于为交响音乐民族化创作中如何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了经验探讨。对于福建南音这种有着极高文人化特征的传统乐种而言，理解其艺术规律及其美学观念是对其进行现代性阐释的重要前提。传统音乐的本质规律和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对于构建中国现代音乐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对于这样的音乐文化现象，我们也许可以提出一些期许：以更多元的视野理解传统、理解中国传统音乐所承载的情感经验以及美学观念，进而追求更深层次的人文精神的交流与对话，这或许是中国民族交响乐创作的必由之路。